

丰子恺和丰一吟的父女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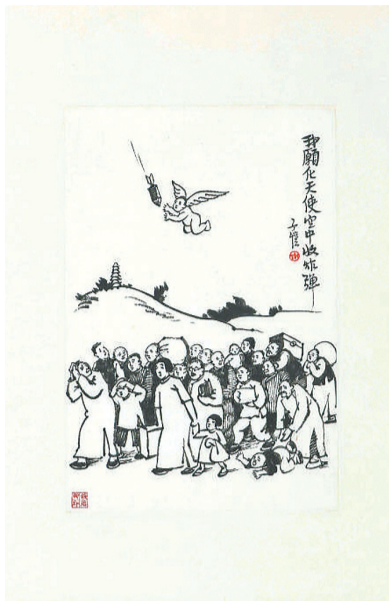
2021年12月11日下午,九十二岁的丰一吟先生在沪去世,对喜爱丰子恺艺术与人生的我来说,丰一吟的离世,似乎是断了我与丰子恺直接联系的最后一根线。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我了解丰子恺,与这些年阅读丰一吟的大量著述分不开。沉思良久,我又想起2005年深秋在桐乡石门湾参观缘缘堂的时候,看到楼上楼下悬挂的全是丰一吟的画,还有丰子恺带着丰一吟出游以及父女二人同读书、同作画的老照片。

从日本人竹久梦二的创作中汲取灵感,丰子恺杨柳翻新的墨笔小品甫一问世,就在文人圈里获得盛赞,随即以“子恺漫画”的名义,借助纸媒广泛流行。1935年春天,丰子恺于《人间世》杂志连载两期《谈自己的画》,答谢林语堂一再约稿的好意。他对自己的画作有如下说明:“说它是讽刺的画,不尽然;说它是速写画,又不尽然;说它是黑和白的画,有色彩的也未始不可称为‘漫画’;说它是小幅的画,小幅的不一定都是‘漫画’……原来我的画称为漫画,不是我自己做主的,十年前我初描这种画的时候,《文学周报》编辑部的朋友们要拿我的‘漫画’去在该报发表。从此知道我的画可以称为‘漫画’,画集出版时我就遵用这名称,定为‘子恺漫画’。”言外之意,虽然大家一味称赞丰子恺的“漫画”,他自己却对此持保留意见。

中国画是设帐授徒传承的。对现代中国画家而言,家族承袭的方式还存在,但无论是子学父画还是女学父画,一脉相承可以,几乎没有完全像的。唯独丰一吟学丰子恺是个例外,画和书法都能乱真。据说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来中国访问,当他看到丰一吟理首整理的丰子恺的文集与画集,又听说丰一吟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过美术,就建议她临摹父亲的画,以此来满足爱好者的迫切需求,如此方才成就了丰一吟晚年的这一特长。那么,丰子恺画的究竟是什么画?一开始丰子恺还吞吞吐吐的,直到1941年他发表《绘画改良论》一文时,索性直白地说:

中国画高似乔木,西洋画深似幽谷。乔木高大,幽谷太深,都不宜于住人。我要走在“人”行道上。我要学习关于“人生”,近于“人情”的绘画……与同志的画友约法七章:(1)不避现实,(2)不事临画,(3)重写生,(4)重透视,(5)重构图,(6)有笔墨趣,(7)合人生味。其中第一、第二是矫中国画之弊,第三、四、五是采西洋画之长。第六、七是保存中国画之长……我要自成一派,不要依附人家。

这一高论,最初我见之于丰一吟的《潇洒风神:我的父亲丰子恺》一书。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,对积弱的时弊,各行各业都在反思,康有为、徐悲鸿就倡导“改造中国画”。丰子恺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创作分为四块:古诗词、儿童相、社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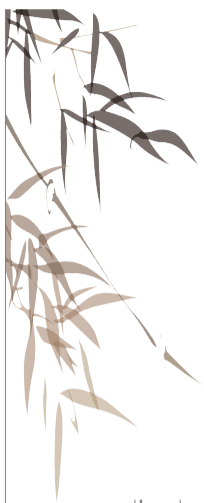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愿化天使 空中收炸弹 丰子恺

相和自然相,旨在表现“人间送小温”的格调,拉近和受众的距离。事实证明,丰子恺的画就像《古诗十九首》那样,经得起历史的检验,没有之前的《楚辞》《离骚》那般繁复,也没有之后的李白与辛弃疾那般豪放;其表现人世和人生的永久况味,一见可直抵人心,令人过目不忘,不仅抚摸我们儿女情长、家长里短的柔软,也触发我们对丑恶与丑陋的愤怒。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,为什么丰一吟能临摹父亲的画?丰一吟晚年时,有人拿来丰子恺的一幅画,因为上面留有炭笔的痕迹,那人认为可能是伪作,丰一吟极坦率地说,这幅画是真的,父亲作画事先多用炭笔勾勒,书法则从索靖的《月仪帖》衍化,自成风貌。此外,丰子恺的画块面分割有规律,红绿交织突出单纯和稚拙,潜移默化受影响,故而丰一吟的临摹几可乱真。只不过丰一吟忌讳他人以假当真,特地在作品上钤印“仿先父遗墨”。作为丰子恺的小女儿,丰一吟成功继承了父亲的书画衣钵和精神;北方人好说“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”,对丰氏父女而言,这个比喻无比恰切,特别温馨。

丰一吟晚年与家人一起整理、出版了丰子恺的文集、画集和相关文献,自己还一连写了几本回忆父亲的书籍——《潇洒风神:我的父亲丰子恺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8年11月)、《我的父亲丰子恺》(团结出版社,2007年1月)、《爸爸丰子恺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4年1月)。这三本书的写作各有侧重,内容并不重复。此外作为上海文史馆馆员,她应邀口述,并由他人执笔完成了《丰一吟口述历史》,也是认识丰子恺人生与艺术的读物。由于丰子恺深受追捧,热度不减,为适应市场需求,近几年丰一吟的著作被“改头换面”,出现诸多版本。

七十多岁时,丰一吟为宣传父亲,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,她对自己的女儿崔东明说:“我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,从未浪费过一分钟。” 来源:北京晚报



“八蜡”与腊八节

“蜡”是古代的一种祭礼,又称“大蜡”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:“天子大蜡八”,又谓“八蜡以记四方”。郑玄注:“四方,四方有祭也。……蜡有八者:先啬一也,司啬二也,农三也,邮表畷四也,猫虎五也,坊六也,水庸七也,昆虫八也。”

八蜡所祭,首为“先啬”,“先啬”即先农,也就是神农氏;次为“司啬”,即后稷,后稷出生在稷山(今山西省稷山县),是尧舜时期掌管天下农业的大官,所以叫“司啬”(“啬”为“穡”之本字,指农事);以下“农”指田畷,也叫“田啬夫”,是到田间监督农业生产的小官;“邮表畷”是在井田交界处建造的供田畷“居以督耕”的临时住所;“猫虎”是有益于农业的两种动物,猫吃田鼠,虎逐野猪;“坊”是堤埂,用来蓄水与障水;“庸”是沟洫,用来受水与泄水;“昆虫”谓螟蝗之属,泛指危害农作物的害虫。

八蜡之祭最初是有关农耕的祭祀。除了祀农业之神,还祀与农业关系较大的人和物,这种祭祀带有我国先民原始的自然本朴特征。北宋的张载认为昆虫不当祀,而以“百种”(各类农作物种子)来替换,殊不知《礼记·郊特牲》还保留有伊耆氏的《蜡辞》:“土反其宅,水归其壑,昆虫毋作,草木归其泽。”意思是说,土不要流失,水不要泛滥,害虫不要发生,草木不要长到田地里。由此可见,祀土祀水祀昆虫,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位张先生太自以为为而且唐突古人了。

一说,腊与蜡是两个祭祀,隋人杜台卿《玉烛宝典》云:“蜡者报百神,腊者祭先祖,同日而异祭也。”西周时这两个祭祀本是分开进行的,蜡祭在郊外,腊祭在宗庙,进入东周以后就逐渐统一为腊祭了。腊祭对象之广,据《礼记·月令》所言,是“皇天上帝、社稷、寝庙、山林、名川”无所不包,所谓“冬至后三戌,腊祭百神”(许慎《说文解字》)是也。腊祭在腊日举行,腊日本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,至于是腊月里哪一天,每年并不固定。后来佛教传入中国,为弘扬佛

法,该教教徒声称腊月初八为释迦牟尼成道日,这个日子也影响到人们岁尾的祭祀活动,到南北朝时期“腊”祭也由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而固定在腊月初八。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云:“十二月初八日为腊日。”“腊八”既兴,“八蜡”初义遂渐被湮没,祭祀文化最终演变成了饮食文化。

据说释迦牟尼修道经历了多年苦行,每日仅食一麻一米。后人不忘他所受的苦难,遂于每年腊月初八吃粥以为纪念。这个习俗也连同佛教传入中国。“腊八粥”又名七宝五味粥,是以各种米、豆、干果等做成,是佛教的斋供之品,故也叫“佛粥”或“福德粥”。早在宋代,此粥已由寺院走向民间,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六云:“……此月八日,寺院谓之‘腊八’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,名曰‘腊八粥’。”至于制作“腊八粥”的食材,差不多与之同时的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谓:“八日,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、松子、乳蕈、柿、栗之类作粥,谓之‘腊八粥’。”

由于各地的物产有别且人们饮食习惯不同,制作“腊八粥”的原料也随之丰富别致起来,并不拘泥于“用胡桃、松子、乳蕈、柿、栗之类”,而是“以果米杂成之,品多者为胜”(明·孙国枚《燕都游览志》)。直至晚清,这种“以果米杂成”“品多为胜”的讲究也没有改变,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“腊八粥”还说:“腊八粥者,用黄米、白米、江米、小米、菱角米、栗子、红江豆、去皮枣泥等,合水煮熟,外用染红桃仁、杏仁、瓜子、花生、榛穰、松子及白糖、红糖、琐琐葡萄,以作点染。切不可用莲子、扁豆、薏米、桂圆,用则伤味。每至腊七日,则剥果漆器,终夜经营,至天明时则粥熟矣。除祀先供佛外,分馈亲友,不得过午。并用红枣、桃仁等制成狮子、小儿等类,以见巧思。”

而今,虽然“腊(蜡)祭”不再举行,可吃“腊八粥”的风俗仍在,而且大家吃得更加营养、更加开胃、更加五花八门、更加富于情趣了。来源:《文史杂志》

